

# 元代江南多族士人圈的地域特色

刘嘉伟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由蒙古族肇建的元王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士人圈”。论文探析了元代江南多族士人圈的地域特色:江南山清水秀、文风郁盛,遂多游宴、文艺雅集;与大都士人圈相比,江南多致仕、辞官、贬谪文人组成的士人圈,亦多以僧人为中心的多族士人圈;元末江南鼎沸,多族士子悼念、认同慷慨报国的非汉族士人,入明后,又结成了遗民圈。江南文化的濡染下,蒙古、色目士子纷纷向风趣雅;异族士子在与汉人的文化交往中,所呈现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宗教也汇入了多元包容的江南文化之中,为其增添了新的色彩。

**关键词:**元代;江南文化;多族士人圈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6)01-0029-07

##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ulti-ethnic Circles of the Yuan Dynasty Literati

LIU Jia-wei

(Literature School,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re appeared multi-ethnic circles of literati in Yuan Dynasty founded by Mongolia nationalit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ethnic circles of literati in regions south of Yangtze River: compared with circles of scholars in Khankaliq, there were more tours and banquets, more retired officials and monks in the circles of literati; in the late Yuan the non Han Nationality scholars mourned and acknowledged patriotic literati.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uth Yangtze River culture, the literati were more and more elegant. The ethnic character,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nationality religion which were presented by the scholars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also imported the diverse and inclusive South Yangtze River culture, and added new color to it.

**Key words:** Yuan Dynasty; culture of regions south of Yangtze River area; the multi-ethnic circles of literati

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肇建的元王朝疆域辽阔、族群繁复、文化多元。蒙元前期,统治者西征南

收稿日期:2015-1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13FZW066);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二期项目“中国语言文学”(PAPD)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嘉伟,男,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客座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元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伐,少谙文事;定鼎中原后,大批蒙古、色目人士散居内地,浸润于汉文化之中。少数民族士人阶层在元代,尤其是中后期迅速形成。并且汉族士大夫认同了服膺汉文化的异族士子,“胡”“汉”士人往还密切,互动频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士人圈”。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概念由台湾学者萧启庆先生提出,就此议题,萧先生发表了多篇文章。后又出版专著《九州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版)。该书论列了元代蒙古、色目士人群体的出现、社会网络、文化互动、群体意识等问题。可惜天不假年,2012年萧先生谢世,“多族士人圈”这一中国历史上较为新异的文化现象便少有人回应论说了。笔者不揣固陋,想就萧启庆先生未暇涉及的多族士人圈地域分布问题加以探析。

文学史家邓绍基先生曾作诗道:“西域岂徒萨天锡,试看南北竞瑶华。”<sup>[1]</sup>在民族高度融合的元代,多族士人间联系紧密、情感深挚,全国各地几乎都形成了“多族士人圈”。而最为活跃、最为集中的,是大都和江南。“大都”作为元王朝的首都,多族共居,人员流动性强。大都政府机构中,官员族属涵盖了四大族群。尤其是翰林国史院等文教机构,汉族官员人数较多,更容易带动异族士人趋风向雅。至正三年(1343),国史院多族士人曾共同编修宋、辽、金三史,蒙古人脱脱任总裁官。翰林国史院还负责兴学育才,开科取士。有元一代,国子监一直以培养蒙古、色目生徒为主,而学官多是汉人,异族师生之间,自然容易结成关系紧密的多族士人圈。在元代特殊的历史文化时期,科举考试是从四大族群中分别选拔人才,各科座主和同年之间虽族属不同,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于大都多族士人圈的情况,笔者曾撰文探讨过,此不赘言。<sup>①</sup>本文中,拟就元代江南多族士人圈展开论说。

元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尤其是大都,而文化与经济中心则在江南。江南者,犹元之江浙行省也。江浙行省的辖境相当于今天浙江、福建两省及江西鄱阳湖以东,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地区。在蒙元铁骑征服以前,北方地区已长期被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风俗趋同,成吉思汗的圣旨中甚至说“山后百姓与本朝人无异”<sup>[2]</sup>。就是说,在13世纪前期的成吉思汗及拟写圣旨的中书令耶律楚材等人心目中,燕云十六州北部的汉人和原契丹人、原女真人等已经属于“准蒙古”人了。这也使得民族心理隔阂小,易于形成多族士人圈。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蒙古灭金,统治北方;而直到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元军才攻克南宋,一统南北。加之巨大的政治、文化隔膜,南宋遗民赋诗作文抵抗元政权者比比皆是,一时间难以形成紧密的联系,建立深厚的情感。所以江南多族士人圈较之大都,在形成时间上,要晚半个多世纪。

元王朝一统南北后,“昔江南平,中土人士南走,若水趋下,家而占籍者有之,衔命仕者又倍徙焉。”<sup>[3]</sup>蒙古、色目人或仕戍、或经商,大量南迁。遂有所谓“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的说法。<sup>[4]</sup>《南村辍耕录》卷二八载:“(杭州)聚景园,回回丛冢在焉。”蒙古、色目人生长于斯、长眠于斯。多族共居,接触日久,自然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浸染;甚至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卓有成就,跻身于名家之列。有学者指出:“(元代)对历史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蒙古、色目人士,也以江南地区出现的为最多。”<sup>[5]</sup>“胡”“汉”士人间有着近似的文化修养,共同的文化底蕴,汉族士大夫也渐渐接受了认同中原文化的异族人士,以“吾党”“吾徒”视之。接下来我们想着力探讨的,是较之大都,江南多族士人圈的地域特色。希望对于中国多民族交流史,江南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有所助益。

## 二

江南地区山清水秀、景色怡人。孔子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老子的功成弗居,庄子的逍遥境界,也使得士大夫乐于隐逸林泉、纵情山水。而蒙古人所信奉的萨满教崇拜自然,西域多

①参见刘嘉伟:《元大都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与元代清和诗风》,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55-62页。

个部族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也尊崇自然。受到多重文化影响的蒙古、色目士人居于江南,自是亲山乐水。他们闲暇之时,常常呼朋引伴,优游于山水之间。

至治二年(1322),江南行御史台的僚友同游建康(今南京),许有壬《至正集》卷十五《九日登石头城诗序》详记其事。此次登临石头城的,有蒙古人万家闰,畏兀人八札,畏兀廉氏家族廉公瑞,阿鲁灰族属不详,从名字上来看,也应是蒙古或色目人。他们和汉族僚友游山玩水,俯仰古今;兴之所至,赋诗纪行。御史中丞石珪、治书侍御史郭思贞二人“督诗不已”,各诵所作;看来蒙古、色目人亦能为诗,而且所作之诗“率古作之杰出者”,质量颇高,多族僚友有着近似的文化修养。几人“相与大笑倾倒”,深杯屡空,也说明了多族士人关系融洽,了无隔阂。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至正九年(1349),福建廉访司僚友僧家奴、奥鲁赤、赫德尔等人在道山亭燕集联句。至正二十一年(1361),福州西郊“玄沙寺小集”,更具有代表性。据贡师泰《玩斋集》卷八《春日玄沙寺小集序》所记,此次集会邀集者为廉惠山海牙。惠山海牙,字公亮,是北庭畏兀世家子弟,名臣廉希宪族子,属色目人。参与者中,翰林院经历答禄与权,字道夫,是乃蛮王孙,属蒙古人<sup>①</sup>;户部尚书贡师泰出身安徽宣城,属南人;李国凤,字景仪,则出身济南官宦世家,属汉人。同游之人,分属于四大族群,却关系十分融洽。廉惠山海牙“数起舞,放浪谐谑”,答禄与权“设险语,操越音”,可见少数民族士人的能歌善舞、诙谐幽默,如此“放浪”,亦可见元代多族士人间的亲密无间。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庄重自持的高昌畏兀儿人铁清溪亦开怀大笑,不胜酒力的贡师泰也举杯畅饮。他们在一起的活动:分韵赋诗,参禅问道都极具文化色彩;而且忧心时局,共谈国事。这些活动表明了多族士人圈关系之紧密,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政治追求;也体现了江南多族士人圈多游宴的文化互动特色。

金哈刺,生卒年不详。弗林人,赐姓金,字元素,是有基督教信仰的“也里可温”。至正年间,哈刺曾任中台御史,改福建海道防御,后升行省参政;与刘仁本等为保持元朝对东南的领有,殚精竭虑。哈刺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弗林文学家,其诗集《南游寓兴集》是为官江南时所集,在中国散佚已久,仅于日本东京“国立公文书馆”藏有抄本,笔者有幸窥其全貌。其中《江楼宴集》:“元帅台城驻节旄,兹楼时复一登邀。倚栏呼酒传金碗,凭几题诗连彩毫。海水遥通江水碧,黄山浑似赤山高。盍簪俱是风流客,醉折梅花香满袍。”以诗的形式记载了多族士人的一次雅集,大概也是兵乱中江南士子难得的一次欢饮。“盍簪”出自《周易·豫卦》:“勿疑,朋盍簪。”王弼注:“盍,合也;簪,疾也。”孔颖达疏:“群朋合聚而疾来也。”后常以“盍簪”代指士人聚会。这次聚会宾主尽雅,皆为风流之客,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沟通友谊的媒介便是诗与酒。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也是元末江南多族士人醉情山水的一个不错例证。

以上所举多为游宴雅集,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艺雅集亦复不少,江南尤盛,最著名的当属玉山草堂雅集。集会主人顾瑛(1310—1369),一名阿瑛,别名德辉,字仲瑛,昆山(今属江苏)人。他推奖艺文,极为热心,经常召集文人雅士在自己营建的“玉山佳处”吟赏烟霞,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与会的杨维桢、李孝光、柯九思、黄潜、张雨、倪瓒、高明等人皆名重当时。蒙古人聂鏞、泰不华,弗林人金哈刺、唐兀氏昂吉、畏兀人唐古德(马九霄),契丹人石抹宜孙、女真人兀颜思忠以及族属不详的旃嘉闾都是草堂座上客;唐兀氏斡玉伦徒、孟昉也和玉山主人顾瑛有诗文往来。雅集主人顾瑛虽为“南人”,但好文喜客,雅纳多族士人,使得玉山之会在文化上更为多元。这也是江南规模较大,活动较为频繁,人员较为固定的多族士人圈。

早在玉山雅集前,在鲜于枢寓邸,也有过两次多族文艺雅集,只不过规模要小很多,所以我们放在这里,略为介绍。鲜于枢(1257—1302),字伯机,蓟州人,是元代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至元二十四年(1287)任两浙转运司经历。在人文富盛的江南,鲜于枢经常和多族士人谈文论艺。大德二年(1298),于

<sup>①</sup>乃蛮部在《南村辍耕录》中被列为色目人。萧启庆《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一文中提及:“若干部族究属蒙古,抑属突厥?难以确定。本书暂将比较成问题的乃蛮、怯烈……断为蒙古”,收录于《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3页。本文从萧先生的论断。

枢召集周密、赵孟頫、邓文原等名流同赏晋王羲之《思想帖》及北宋郭忠恕《雪霁江行图》，同观十三人者，有畏兀人廉希贡。之后，为庆祝“霜鹤堂”落成，鲜于枢又召开了一次雅集，有十二人参加，包括回回画家高克恭和诗人、画家萨都刺。以汉人鲜于枢为中心的雅集，发生在元中期，时间较早；所邀名流，层次较高，是江南多族士人圈较早的艺术活动。

关于多族士人圈的雅集，大都也有。如天历（1328—1329）、至顺（1330—1332）间，礼部蒙古、色目、汉人同仁圣安寺游宴；至治三年（1323），蒙古长公主祥哥剌吉召开的天庆寺文艺雅集；至正十一年（1351），葛逻禄诗人迺贤与危素等七人出游大都南城等等。相形之下，江南多族士人圈的游宴更加频繁，如玉山雅集等文艺之会在时间上更加持久，参与人数更多。

### 三

除了多族同僚的活动外，蒙古、色目士人致仕、辞官、贬谪后，居于江南，形成了一个多族士人圈；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与权势集团疏离的隐逸情怀。这和大都士人圈多僚友互动、多求仕干谒有所不同。

阿里木八刺，字西瑛，西域回回，元曲家阿里耀卿之子。他将松江居室名之为“懒云窝”，白云：“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商调·凉亭乐]《叹世》）阿里之懒云窝，是吴城（今江苏省苏州市）多族士人聚会之所。西瑛擅长吹奏龟兹乐器箏篥，贯云石为其作《箏篥乐》诗，释惟则赋长歌以赠，乔吉、卫德辰、吴西逸等人亦有曲相和。他的“懒云窝”，一时名流题咏几遍。元代画家曹知白（1272—1355）传世名画《群山雪霁图》有其题款：“洼盈轩为懒云窝作。”还有黄公望的题跋。可见这位西域才子与江南友人交往之频繁。

和阿里木八刺过从甚密的贯云石（1286—1364），畏兀儿人，曾任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他是大都“廉园”多族燕集的上宾，参与过皇庆二年（1313）的“桃花岩”赋诗等活动，活跃于大都多族士人圈。后称病，“退与文士徜徉佳山水处，倡和终日，浩然忘归。”在江南，贯氏广交各族友人，“所至，缙绅之士，逢掖之子，方外奇人，从之若云。得其词翰，片言尺牘，如获拱璧。”<sup>[6]</sup>他归隐后，也融入了江南多族士人圈，赢得了广泛尊重。还有不少蒙古、色目人退隐江南，广结士人，在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迺贤（1309—1368），字易之，汉姓马，葛逻禄氏。长年漂泊大都，求仕不成，至正十三年（1353）年前后，归返江南，隐于四明山中。他曾和北庭画家边鲁同访倪可与，乌斯道。

杨维桢称边鲁“天才秀发，善古乐府诗，尤工画花竹，然权贵人弗能以势约之。”（《西湖竹枝集》）这位色目画家傲岸高洁，不屑于依附权贵，却欣然为汉族好友作画。四人谈论绘画技法、艺术理念，“笑语者终日”，最后饮酒而别。亦可见元末江南多族士人关系之和谐，情趣之高雅。

此外，蒙古人达里雅斡于至正三年（1343）任江宁县达鲁花赤，以浚河祸民，谏止而忤上官，拂袖而去。宦场失意后，他寄情诗酒，“所至且为诗歌，畅饮赋景，饮酒谈笑”。<sup>[7]</sup>蒙古人聂鏞“飘泊江湖未有涯，南北东西营一饱。”<sup>[8]</sup>至正中叶栖居江南，参与了昆山玉山草堂、金坛良常草堂的诗酒雅集。龟兹人盛熙明于至正十四年（1354）游浙北武康计筹山，与江浙名士扬伯振、张绅、杨维桢、葛元喆、高明等皆有往来。后谢病居海滨，寓四明之盘谷，结交僧道，和江南名士刘仁本相交尤密。这些蒙古、色目人都结交着当地士人，彼此结成了多族士人圈。

在中国文化史上，唐代就有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倾向。士大夫常常和僧道谈文论道，往还密切。但元以前，士大夫常常是文人圈活动的中心，如苏轼的周围有佛印禅师、僧寥子、文长老等僧人。而在元代的特殊历史文化时期，统治者推重宗教。清人赵翼称：“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陔余丛考》）僧、道的地位有所提升。僧人遂成了士人圈的中心，且广结异族文友，这可以说是元代多族士人圈的特色，而僧人为中心的多族士人圈，亦以江南为盛。我们可以释来复、释大诰为例，略为概括。

释来复（1319—1391），字见心，号蒲庵，丰城（今属江西）人。曾主四明定水寺，后至元七年

(1341),宣政院札住灵隐寺。来复早有诗名,为时所重,且交游广泛,将所与交游者酬唱之诗结集为《澹游集》,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该集上卷收所与酬唱者凡170人,其中蒙古、色目19人,赠诗计有35题47首之多。来复《蒲庵集》中,有其赠丁鹤年的《冰蘖斋记》及诗3题4首,与忽督察总管、普颜帖穆尔书,赠蒙古月鲁不花、唐兀氏郛密执理、葛逻禄氏迺贤、高昌偃哲笃之诗。此外,投赠对象还涉及到了7位濡染汉文化的日本僧人和1位天竺僧人,可说是交游遍天下。多族士人间赠答之诗,“情趣高远、辞气清朗如大羹玄酒、醍醐甘露,隽永存焉。”(刘仁本《澹游集序》)这个以僧人为中心结成的士人圈,以诗文往还为交游基础,所作之诗多旨趣淡远。

释大诘,字笑隐,南昌人。曾主湖州乌回寺,迁杭州报国寺。元代文坛宗主虞集为其所作《神道碑》云:“中朝、西域、高昌、三韩、滇池、于阗与湖、江、汉、关、蜀、闽、广之俊杰,四面而至,法席莫尚焉。师之居于是也,自中朝、外藩、台阁、风纪、贵人名公卿,至者莫不倾盖为礼,非人力所能致也。而文辞言语,流传四方,震荡耳目,亦顾眄雄睨于一时矣。”从这段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诘上人非凡的感召力,不仅是汉族士人乐于听法,“西域、高昌、三韩、滇池、于阗”等西北、东北、南疆的少数民族人士,甚至异邦友人都慕名而来。大诘以说法之余事为诗文,倡斯文于东南,色目文士萨都刺、偃逊等人皆委心而纳交。其《送萨天锡照磨赴燕南宪幕》:“萧寺留诗别,高怀不负公。”<sup>[9]</sup>对回回诗人萨都刺青睐有加。萨氏题诗寺中,主持长老以诗送别,也可见多族士人间的情谊。此外,释大诘还作有《次韵萨天锡台郎赋三益堂芙蓉》;应畏兀人偃逊之请,作《近思斋铭》。天历元年(1328),文宗自金陵(今南京)入继大统,命以潜邸之旧为龙翔集庆寺,特选大诘主持,授太中大夫。龙翔寺为蒙古人岳柱(咬住)筑基营造,因此释大诘与之交往颇多,赠诗三首。北庭释鲁山(约1280—1345)为元代著名色目诗僧,被委任平江善农提举司提举,掌龙翔寺田赋,大诘亦与之交好,作有《鲁山铭》。

在大都,也有僧人为中心的多族士人圈,如吐蕃僧人沙啰巴主持的清香诗会,只不过是其在驿馆召集几位故友,讲论佛法、诗法,远没有江南士子为中心的士人圈庞大。要之,蒙古、色目士人能方外之士相交甚善,彰显了元代各族士人、各个阶层间交游的紧密,也显示了元末江南多族士人圈脱去声色势力的文化特色。

#### 四

元末战火四起,尤以江南最为鼎沸。清人顾嗣立称:“迨至正用兵,勋旧重臣与有封疆之责者,往往望风奔溃败衄,遁逃之不暇。而挺然抗节,秉志不回,乃出于一二科目之士,如达兼善、余廷心者,其死事为最烈,然后知爵禄豢养之恩,不如礼义渐摩之泽也。”<sup>[10]</sup>达兼善即伯牙吾台部泰不华,余廷心即唐兀氏余阙。二人死节之后,江南士子纷纷以文哀悼。由异族士子人格感召力而引发元末士大夫的政治认同,这可说是江南多族士人圈的特点,也可说是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

泰不华(1304—1352),字兼善,伯牙吾台部,蒙古人,世居白野山。<sup>①</sup>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兵起江浙,烧掠沿海州郡,叛降不定。泰不华上陈招捕之策,帝不听。十一年,元廷以泰为浙东宣慰使,都元帅,分兵温州,夹攻方氏。十二年,行台州路达鲁花赤。三月,与方国珍决战,不敌身死。赠行省平章政事、魏国公,谥忠介。和泰不华的事迹相比,余阙守城更为艰苦,死事更为惨烈。余阙(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今属甘肃),生于庐州(今安徽合肥)。至正十一年(1351),淮南乱起,分兵坚守安庆,累升至淮南行省右丞。苦心孤诣,支撑危局,坚守安庆六年之久。至正十八年,安庆四面受敌,阙自刎殉国。谥文忠。

<sup>①</sup>元代蒙古、钦察、康里均有伯牙吾台部,泰不华的族属便有了争议。但根据《书史会要》《秘书监志》等元人记载和只有蒙古生员才能得中状元的元代历史情况综合来推断,“蒙古说”比较可信。

泰不华被民呼“到底清”者。《元史》卷一三四《泰不华传》载,其殉国之前“语众曰:‘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徕,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众皆踊跃愿行。”可见余阙在江东士庶中巨大的人格感召力。李士瞻《题安庆余阙廷心左丞相死节说》称余阙:“日与军士庶民相亲睦,一如父子,而人亦甘为之用。”(《经济文集》卷四)《元史》卷一三四《余阙传》载其死节后,同其殉国者以千计。可见其在江东士庶中的巨大影响力。

泰不华、余阙死后,在江南多族士人圈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各族士子纷纷以文哀悼,以达敬仰之情。台湾学者王德毅等人所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著录祭奠泰不华之文3篇,诗2首,赋1篇;祭奠余阙的传1篇,文11篇,诗24首。这些诗文,不吝赞美之词。如元明之际危素《挽达兼善》:“大将忠精贯白日,诸生揽涕读哀词。”<sup>[11]</sup>吴澄之孙吴当《挽余忠宣公》:“一片精忠元不改,男儿到此是男儿。”(《学言稿》卷六)不一而足。不仅泰不华、余阙享此哀荣,唐兀氏迈里古思、星吉,回回人获独步丁及其兄长穆鲁丁、海鲁丁,高昌人偃烈箴,合鲁温氏迭里弥实、蒙古札刺尔氏拜住等人以身殉国后,都有汉族士大夫以诗文、碑铭等形式予以哀悼。而且悼文感情真挚,绝非搪塞浮夸之作。如元明之际的著名诗人戴良读到恩师余阙的三封手帖,“盖不知涕泗之横流也”<sup>[12]</sup>,继而写下了饱含深情的《余翁公手帖后题》。

翻检汉族士人写给异族忠烈的悼词,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元人吴当,周巽将余阙比作颜杲卿,无独有偶,范秋蟾《达元帅诗》中也以颜杲卿比附泰不华。至于把余阙比作唐之张巡、许远者,更是比比皆是。颜杲卿、张巡、许远都是在安史之乱中与安禄山作战,不屈而死的英雄。他们的敌对方是“胡人”,而在元代的特殊历史时期,多族士人将国家认同置于族群认同之上,盛赞为国尽忠的“胡人”泰不华、余阙,这就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了。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及内心的承诺(commitment),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sup>[13]</sup>在各族士大夫认同异族士人,认同元政权的过程中,文化认同至关重要。泰不华多才多艺,在儒学、小学、诗歌、书法等诸多领域皆有建树,就是汉族文人也罕有其匹;余阙“文章、学问、政事、名节,虽古之人有不得而兼者,而廷心悉兼之。”<sup>[14]</sup>他们认同汉文化,并取得了卓越成就,自然使得汉族士大夫青眼相看。有了文化上的认同,才可能形成关系较为紧密的多族士人圈;由文化认同,进而到对元政权有了政治认同。

有学者考察元末明初江南士人境遇后,指出:“元末的江南士人,不论伊始依附张吴政权的,或参加朱明政权的,乃至超脱于元末群雄之间的,他们都在相当程度上怀念元朝,而与朱明政权格格不入。”<sup>[15]</sup>作为统治族群的成员,蒙古、色目人和元廷同舟一命。元亡后,在江南的少数民族士人有不少隐居山水之间。汉族士子也有很多人怀念旧国,不事新朝,多族士人结成了志节相同的士人圈。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军入福建,畏兀人伯颜子中“潜行遁迹,隐约江湖间,时宦寓公知名愿交者,皆不得一见。”但独与遗民熊钊相厚善,两人“每语及往事,相对悲鸣烦促,涕泗潸然下。”<sup>[16]</sup>回回人丁鹤年和戴良、龙从云等人相交深厚,易代之际,同隐居山林。浙西王逢《寄桃浦诸故知即事》自称:“平生气节诗千首,才非元亚甘刘后。”(《梧溪集》卷六)以遗民自居。他的《梧溪集》充溢着故国之思,黍离之悲。该集卷五有《俭德堂怀寄》廿二首,系怀22位遗民。其中,完哲、买住、铁穆、长吉彦中、刺马当、观同皆是蒙古、色目人。说明以王逢为圆心,形成了一个族群各异,但皆心系旧国的士人圈。我们可以看到,悼念、认同慷慨报国的异族士人,入明后,多族士人结成遗民圈,这也是江南多族士人圈的特色。

## 五

综上所述,较之大都,元代江南多族士人圈在时间上,形成较晚,但士人间的互动比较频繁,特色也较为鲜明。多游宴雅集,多退隐、方外之士的活动,多悼念志节之士,多遗民士人圈为江南多族士人圈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又与江南山水文化、隐逸文化等文化质素相表里。

江南本属“楚越之地,地广人希”(《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江南文化本就是向外来文化不断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有着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加之郁盛的文风,优越的人文环境,陶冶、吸引着许多向往中华文化的异族人士。文化无优劣之分,但有强弱之别,多族士人圈的思想基础自然是辐射力强、底蕴丰厚的中原汉文化。但文化间的互动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从上述所举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福州玄沙寺小集中,廉惠山海牙的“数起舞”、答禄与权的诙谐幽默,还是能够表现出异族士子的民族性格的。就算是表现山水,少数民族诗人所用意象也十分奇特。蒙古人聂镛写嘉定天目山:“拔地起千仞,去天不盈尺,剑矛辉日洁,芙蓉承露滴。”<sup>[17]</sup>西域人聂古柏《番禺道中》:“云开梧野山罗戟,月满韶江水泼蓝。”<sup>[18]</sup>形容南方山水,两位诗人都不是用青山如黛或者绿荫如裳等柔美的比喻方式,而是使用了“剑矛”“戟”这样的意象,隐然可见尚武的文化基因。前文所提到的金哈刺是基督教徒,写有《寄大明寺元明列班》,“列班”即基督教教士的叙利亚语音译。色目士子以汉语写诗,寄赠基督教士,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颇为罕见的。异族士子在向汉文化的学习过程中,在和汉族士人互动中,所呈现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宗教也汇入了多元包容的江南文化之中,为气象万千的江南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诗经》有言:“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小雅·伐木》)元代多族士人以文会友、同气相求,认同了彼此的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人际交往。在元代江南民族重组的过程中,文化起到了融合剂的作用,说明了中华文化巨大的包容力、凝聚力与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19]</sup>今天,我们对于江南多族士人圈地域特色的揭橥,无疑也会给今天的民族工作,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提供历史的借鉴。

#### 参考文献:

- [1] 邓绍基. 金元诗的发展[J]. 荆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2(4): 5-10.
- [2] 宋子贞. 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M]// 李修生. 全元文: 第1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172.
- [3] 许有壬. 葛公墓碑[M]// 许有壬. 至正集: 卷五三, 影印本.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262.
- [4] 周密. 癸辛杂识续集上[M]. 吴启明, 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38.
- [5] 潘清. 江南地区社会特征与元代民族文化交融[J]. 东南文化, 2004(6): 52-58.
- [6] 欧阳玄. 贯公神道碑[M]// 欧阳玄. 欧阳玄集: 卷九. 陈书良, 刘娟, 校.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111.
- [7] 刘诜. 送达子通[M]// 李修生. 全元文: 第22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2: 57.
- [8] 张宪. 赠答蓟丘聂茂宣[M]// 张宪. 玉笥集: 卷六.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95.
- [9] 萨都拉. 雁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413.
- [10] 顾嗣立. 元诗选初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729.
- [11] 全明诗编纂委员会. 全明诗: 第一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457.
- [12] 李军, 施贤明. 戴良集[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248.
- [13] 周翔. 文化认同·代际转换·文学生态——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动态发展历程[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5): 55-61.
- [14] 李祁. 青阳先生文集序[M]// 王毅. 云阳集.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53.
- [15] 郑克晟. 明清史探实[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32.
- [16] 朗瑛. 伯颜子中传[M]// 朗瑛. 七修类稿.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167.
- [17] 聂镛. 送张吴县之官嘉定分题赋得天平山[M]// 王叔磐, 孙玉溱. 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 185.
- [18] 顾嗣立. 元诗选三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54.
- [19] 郝时远.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几点体会[J]. 民族研究, 2014(6): 1-11.